

中国文化 与海外 华文文学

彭志恒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汕头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学术丛书

中国文化与海外华文文学

彭志恒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与海外华文文学/彭志恒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9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学术丛书/吴奕锜等主编)

ISBN 7-5059-3256-X

I. 中… II. 彭… III. 华人—文学创作—研究—世界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0099 号

书 名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丛书 (1—6 册)
作 者	吴奕锜 等主编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顾 苹
责任印刷	邢尔威 顾 苹
印 刷	广东省揭阳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210 千字
印 张	51.75
插 页	12 页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60 套
书 号	ISBN 7-5059-3256-X/I·2465
定 价	8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献给我的母亲张秀清
和我的父亲彭学义

总 序

汕头大学是由香港爱国实业家李嘉诚先生捐巨资兴办的广东省属综合性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传统学科，也是综合性大学中重要的基础学科。汕大于1983年招收第一批本科生，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便是首批招生的专业之一。中文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是著名的文字学家梁东汉教授，建校伊始，梁先生便很严格地按照他任教过的北京大学的办学和治学模式来建设汕头大学的中文系，在教学上注重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性，注重对学生应用基础知识能力的培养；在科研上，重点发展师资力量较强和具有地方特色的专业方向。十几年来，中文系的领导已经换了好几届，教师队伍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学科建设的思路基本不变，中文系的办学水平和学科建设水平则得到不断的提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毕业生就业情况一直看好，一些优秀毕业生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出了一番成绩，被提拔到了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岗位上。其二是考上硕士研究生的本科生越来越多，1998年实现零的突破，1999年考上5名，占全部毕业生的15.2%，2000年又考上了9名，录取学校包括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名校。其三是已有《美学原理》和《现代汉语》两门课程被评为省级重点课程。其四是1993年开始与暨南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1997年，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硕士点——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点，至今已毕业硕士生12名，

其中有3名分别考上复旦大学和山东大学的博士生。

作为汕大“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项目，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方向主要有四个：一是“汉语方言和文化研究”，二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三是“文艺美学研究”，四是“中国古典名著的文化阐释”。

前两个方向立项的依据主要是其地方性和国际性。汕头大学位于粤东地区，这里不但是闻名国内外的中国五大经济特区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侨乡。据侨务部门统计，潮裔华侨、华人约有1000万，这个数字正好跟潮汕本地人口基本相同。而在海外的华文作家中，潮汕籍的大约在60%以上，特别是东南亚等国家，比例更高。这些作家们常常回故乡省亲或进行学术交流，因而，在汕头大学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有着血浓于水的亲缘优势。1984年，汕大成立了“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并创办了《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杂志，打那时开始，汕头大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就一直没中断过。1999年8月，由陈贤茂教授和吴奕锜副教授等撰著的4卷本200万字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出版，受到了海内外行家的广泛好评，被誉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其次，粤东地区不但是个著名侨乡，而且还是个闻名国内外的汉语方言宝库，曾受到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 Karlgren）、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等的重视。如果从我们现在发现到的1847年出版第一本英汉对照的潮州话词典算起，对粤东方言进行的历史已有了150多年的历史。在粤东这片不大的区域里，集中着汉语七大方言中之三种——闽、粤和客家方言。我们身在“矿区”之中，集中力量更深更广地挖掘宝藏，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这可以说是一种地缘上的优势。另外，在海外的1000万潮裔华人、华侨的汉语方言变异情况，也是一个颇具国际性的社会学和语言学要共同研究的课题，

值得我们像愚公那样去挖山不止。

后两个方向的立项依据主要是我们有较强的师资力量和较多的成果积累。中文系的文艺理论教研室曾承担过国家“八·五”计划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为拓宽当代中国美学的研究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目前，我们正着力于审美文化和艺术文化学的研究，在美学与文化学、美学与语言学以及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双向互动的沟通中，努力开创新的学术研究的局面，使中文系的文艺学科通过“211工程”建设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中国古典名著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情感结晶和文化瑰宝，其中蕴涵着极为丰富、极为深邃的文化质素。汕头大学中文系从事古代文学史教学、科研的教师们，从现代文化的角度出发去阐释古典文学名著的内在意蕴，已经在《周易》、《老子》、《庄子》、《诗经》、《楚词》、《史记》、唐诗宋词和《红楼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相当重要的学术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显示了汕头大学中文系在古典文学名著研究方面的特色。

此次出版的《汕头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学术丛书》，是我们在上述四个方向做出的最新成果。出版这套丛书，既是为了感谢慷慨捐资支持汕头大学“211工程”建设的敬爱的李嘉诚先生，感谢广东省人民政府、省教育厅和所有关心我们的领导、同行和朋友们，也是为了接受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和专家学者们的检阅和指教。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从而把我们的学科建设得更好。

汕头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课题组
2000年暑假

论“反传统”（代序）

王富仁

“反传统”这个词在八十年代曾经是一个很响亮的文化概念，但到了九十年代，这个词就臭了起来，似乎人人都在回避这个词，各家各派都不再对这个词抱有同情的态度。现在是回归传统的时代，各家各派都在寻找自己的传统，但惟独对“反传统”的传统没有了兴趣。但是，大家都不再“反传统”了，是不是现实的社会矛盾就减少了呢？是不是文化界的斗争就平息了呢？似乎也不是！在我看来，九十年代后的现实社会和文化界还不如“反传统”的八十年代更有生气、更能沉稳地追求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那时的知识分子彼此还有更多的相互理解和同情，至少在以知识分子为职业的人们之间是这样。现在不反传统了，现实社会的矛盾反而加深了，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撕破脸皮地互相骂，骂到了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骂的程度，骂到了莫名其妙的程度，各自都向对方的脸上泼污水，搞得人人都没有了个人样子。由此看来，“反传统”也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不“反传统”也不是多么惬意的事情。我是当过一阵子“反传统”派的，至今对这个词没有太大的恶感。在这里，我得为“反传统”正一正名。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很厌恶“反传统”，实际上，作为我们知识分子的传统，本身就是“反传统”的。不反传统，要我们知识分子有什么用呢？

传统是什么？传统就是已经凝固成现实的文化，是我们的前人、我们的古圣先贤创造的文化。这些文化，在当时也是反传统的，也是不满于现实的，但到了后来，他们的文化为人们接受了，成了人人都必须说好而不能说坏的文化，就凝固在我们的现实之中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已经实现，而是能够实现的已经实现了，不能够实现的用他们的方式也无法实现了。文化就凝固了，就变不了了，就成了一个固定的套子。但是，这些文化固定了下来，社会却没有固定下来，一代代的青年人起来了，他们也要进入社会，也要钻进这个由过去的人已经缝好了的套子里去。当然，好多人也钻了进去，在这个套子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重复着前人已经重复了多少年的工作，说着前人说了几千年的话，用着古人用了几千年的方式思考着古人思考了几千年的问题，得到的也是几千年的人得出的同样的结论。这些人是有福的人，是人生道路上的胜利者。他们的生活象坐滑梯一样顺顺溜溜地就滑了过来，一生也没有遇到过多么做难的事，没有经历过内心的痛苦和磨难。即使有些小沟小坎的，依靠他们的聪明和才智，也轻而易举地淌了过来，不象创造这种传统的前人那样费力气。但是，古人给我们缝的这个社会的套子却是有雅和俗、高和低、尊和卑、富和穷、舒服的和不舒服的各种不同的格格的，一代代的青年都愿向雅的、高的、尊的、富的、舒服的格格里钻，而不愿向那些俗的、低的、卑的、穷的、不舒服的格格里钻。这也是传统，传统之所以分出这样的差别来，就是引诱你去钻那些雅的、高的、尊的、富的、舒服的格格的，就是要引诱青年人去争、去抢的。差别仅仅在于，在古圣先贤划分这些格格时，那些雅的、高的、尊的、富的、舒服的格格是最难上的，是要付出比一般人都要艰苦的努力甚至牺牲的，现在有了文化的滑梯，有了固定的方式，那些聪明的人、条件好的人、有贵人相助

的人、命运好的人就不用费那么大的劲了，轻轻松松地就能钻了进去，而其余的人就是付出了比原来更沉重的代价，更艰苦的努力也无法钻进去了。他们只好被挤到俗的、低的、卑的、穷的、不舒服的格格里去。开始时心里很不乐意，很不习惯，但时间长了，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明明知道这是一些不值得骄傲的格子，但也没有法子想，只得认倒霉，反正这些格子里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别人能过，自己也能过。有些不舒服也就忍耐了下来。如果说前一类人是一些有名的英雄，这一类人则是一些无名的英雄。社会就靠着这两类英雄人物存在下来，传统就靠着这两类英雄人物延续下来。他们的处境不同，感受不同，但不会反传统：那些钻进了俗的、低的、卑的、穷的、不舒服的格格里的人们，也能为自己没有反传统而骄傲、而自豪。他们觉着自己的牺牲是为传统而牺牲的，为道德而牺牲的，为人类而牺牲的。社会虽然无法实际地改变他们的处境，但对他们的牺牲还是承认的，还是同情的，在道德上不能不承认他们的伟大。仅此一点，他们在精神上就获得了慰安，就有了受苦受难的力量，而那些钻进了雅的、高的、尊的、富的、舒服的格格里的人们，就更不用说了。多亏传统，使他们成了有鼻子有脸的人物。社会好好的，传统好好的，反传统做什么呢？

但是，社会上总是有一些别扭头。他们不是以生活看文化的，而是以文化看生活的。以生活看文化，只要自己还有生活，还能吃上饭、穿上衣，饿不死、冻不僵，就能从生活里找出乐子来。有了乐子，生活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了。一乐驱百忧。在他们的观念里，这个“乐子”就是文化，文化得为人制造出“乐子”来，制造不出“乐子”来，我们要文化做什么呢？但这些别扭头不这样看。他们是一些书呆子，一些脑筋不开窍的人。他们不是从生活看文化，而是从文化看生活。文化，就不是讲一

个人的生活的，而是讲社会的，讲好多好多人的事情的。他们这样一看，可就看出传统的毛病来。不论是什么传统，说的都是整体上的合理性，但这个整体上的合理性却是以牺牲一些人而满足另一些人为前提的。这个社会象个整体，但这个整体满足的却不是所有的人，而是一部分的人。在开始，在古圣先贤创造这种传统的时候，牺牲的还似乎是必须牺牲的，满足的还似乎是必须满足的，但到了这种文化成了固定的传统，不论什么人都自觉地向高枝上爬。爬上去的未必是古圣先贤当时认为应该满足的人，爬不上去的未必是古圣先贤认为应该牺牲的人。这样一看，这些书呆子就看出社会文化的混乱来，这个文化的套子仍然是原来的套子，这个传统还是原来的传统，可里面的人变了，套子和对不起茬来了，一切都没有了原来的味道。表面上还是秩序井然，而实际上一切都陷入了无序的状态。这种毛病还能不能依靠传统自身来解决呢？不能了！古圣先贤早已经死了，他们的文化已经定了型，他们想改口也改不了了，实际掌管传统文化的是现实社会中有权力的人，只有他们才对传统文化具有阐释权、使用权，而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又都是得依靠权力的保护的，又是必须承认权力者的这种阐释权和使用权的。在这个意义上一看，他们便明白了传统文化实际上已经不是文化，而是一些固定的社会手段了，即使它还保留着文化的一些表面特征，也已经不是原来的文化，而是换了主人的文化。在开始时，它是那些文化创造者的文化，但当它还是文化创造者的文化的时候，它还不是传统文化，而只是文化。而一当它成了“传统文化”，它的主人就不是它的创造者，而是那些在现实社会有权有势的人了。这样一来，有些书呆子就不呆了，就变得聪明了起来，就不从文化看生活，而知道要从生活看文化了。于是他们就开始融入到现实生活之中去，而另一些书呆子则愈加呆了下去，呆到了发疯的程度。他们感到现实

社会已经没有了文化，一切都成了现实权力的附庸。他们狂妄地认为要重建自己民族的文化，重建现实的、现代的新文化，而要重建自己民族的现实的、现代的新文化，就要反对实际已经不是文化而却被现实社会视为天经地义的文化的传统文化。

这些书呆子，两眼只盯着文化，只盯着传统，看到的是传统文化的毛病，他们自己的毛病是感觉不出来的。但在我们，看的却非常清楚，即他们实际是一些社会神经病患者。为什么说他们是社会神经病患者呢？因为一个社会同一个人一样，也是有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的，这种固定的思维方式就是正常的思维方式。这种多数人的思维方式是怎样形成的呢？是在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濡染下形成的。在开始，这种传统并不是传统，而只是当时个别人的思想学说，是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定的看世界、看社会的方式。但后来被社会的权势者接受了下来，他们认为这种文化对自己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再加上自己的解释，就在社会上推行开来。社会上的多数人是没有自己的文化的，就把这种文化当成了自己的文化。从此，它成了传统文化，也就成了社会上多数人看世界、看社会的方式。成了他们判别是非、美丑、真假的的标准，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有了统一性。所以，传统的思维方式就是一个社会多数人的思维方式，也是这个社会的正常思维方式。社会上一切的是和非、正确与错误、美和丑、道德与不道德，都是以这种正常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些书呆子的思维方式却与社会多数人的思维方式有了不同。而一旦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多数人的思维方式有了不同，他们与多数人的思想就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越跑离得越远。他们无法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改变多数人，多数人也无法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改变这些书呆子。因为两者的思维方式先就不同，对同样的问题没有同样的感受了，对同样的语言也没有同样的理解了：你骂他，他认为你

是夸奖他；你夸奖他，他认为你是骂他。你对他说的是假话，他认为你说的是实话；你对他说的是实话，他认为你对他说的是假话。你关怀他，他认为你是害他；你害他，他认为你是关怀他。……这样的人，还不是一些疯子？一些神经病？不过他们害的不是生理上的神经病，而是社会神经病，文化神经病。医院里的精神病专家诊断不出他们的毛病来，而社会文化的医生又是用传统文化的药方治病的，只能治我们这些正常人的思想毛病，治不了这些文化疯子的病，因为他们得的就是反传统的病，他们不相信传统文化能够治病救人，他们不吃这些医生为他们开的药。

社会上一旦出了这样的疯子，社会上的各种人都感到不安。但这种不安只是心理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在实际上，这样的疯子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社会是由多数人决定的，不是由这么几个疯子决定的。不论历史怎样发展，社会怎样进步，人们愿意接受的，还是传统，还是在社会上已经固定下来的标准，而不是与传统不同的东西，不是当时的社会认为是疯子的标准，我们要办一个学校，说是毕了业就能成为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尊敬的人、都羡慕的人，就能升大官、发大财，成大名，全社会的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进来。你要说我这个学校是培养疯子的，毕了业就被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看不起，就得送精神病院，我敢保证没有一个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进来。社会上的人见了疯子就躲得远远的，不论他说的是什么，都是一些疯话，谁还去听？谁还把他的话当真？所以，历代都有这样的疯子，但都是自消自灭，在周围的人当中引起一些恐慌，也就过去了。在这些人中，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些人疯了一阵子又不疯了；有些人疯了一辈子后来又死了；有些人被感到恐慌的多数人给“处理”了。他们一代代的生，又一代代的死，不能说对社会一点影响也没有，但社会还是社会，人们还是安安静静地在传统文化的被子底下过自己的日

子。社会反因为有了这些疯子，添了一点热闹，加了一点佐料，使原本沉寂的社会显得并不沉寂。并且他们也当了社会的反面教员。家家的家长都指着这样的一些疯子说：“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孩子们一定会说：“不愿意！”“不愿意！那就老老实实地读圣贤的书，听圣贤的话，按圣贤的指示办事，做圣贤的好孩子吧！”对于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这样的反面教员起的作用甚至比圣贤本人还大。

历代都有这样的疯子，历代这样的一些疯子都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但也有个别的疯子让人感到了一点惊异，因为他们除了疯以外有时也会搞出一些奇异的名堂来，而这些奇异的名堂是不疯的人搞不出来、却又能为不疯的人们所把玩、所利用的。就说我国的屈原吧！他就是一个疯子似的人物。人家都穿社会认可的衣服，而他却把些花花草草挂个满身，弄得人人厌恶他，连他的姐姐也不认为他是个正常的人。但也正因为他疯疯势势的，所以他就做出了他的那些诗。他的诗平常的人是做不出来的，但平常的人却感到好玩，感到很新鲜，很刺激。于是正常的人就给了他的诗很多正常的名目，使它成了“传统”，成了历代中国的雅人文士所把玩、所吟咏的对象，但成为“传统”的不是屈原，而是他的诗。谁也不会读了屈原的诗就去自杀，而是觉着他的诗很好玩。再如西方的哥白尼、布鲁诺、伽里略，他们不听教皇的话，不按《圣经》的指示办事，在当时是一些十足的疯子。但他们搞出的那些玩意儿，却被后代人接受了，成了“科学”，“科学”也成了西方人的传统。但作为传统的“科学”，不是让人与当时有权有势的人对立的，不是让人与传统对立的，而是让人感到好玩、感到有用的。所以，这些反传统的书呆子疯是疯，但又不是对人类一点好处也没有。疯子会说出疯话来，疯子会办出疯事来。这些话、这些事，是不疯就说不出来，办不出来的，疯子本

身对人类没有好处，可这些疯话、疯事却未必对人类没有好处。这就给我们出了个难题，不知道到底怎样看待这些疯子了。

人类到底是伟大的，多数人到底是聪明的。这些疯子是人人厌恶的，但他们的一些疯话、疯事又可能对人类有些好处。久而久之，人类就想出一种办法来，就搞了一个知识分子阶层。这个知识分子阶层就是专门储存疯子的。你们都是疯子，就到一块去吧！社会供你们吃，供你们喝，要疯你们一块疯，但不要扰乱社会。在这个范围中，你们说你们的疯话，做你们的疯事，反正我们知道你们是一些疯子，不会把你们的话、你们的事当真的。当你们死了，再在你们的疯话、疯事当中挑一挑，选一选，看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玩意儿，于传统没有多大妨碍的，好留着供人类玩赏，其余的就扔掉了。但这个法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在很多人填不饱肚子的情况下，这些疯子倒有了一个固定的吃饭吃的地方。所以，原来是给这些疯子准备的地方，很多不疯的人也来抢了。疯子当然抢不过不疯的人，所以。即使在这个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传统还是传统，传统文化还是多数人的文化。真正的疯子还是被多数人所排斥的。但是，这个知识分子的圈子到底是一些疯子开辟出来的，到底是为疯子们准备的。这里的传统本身就与社会上的传统有些不同。社会上的传统是正常人的传统，这里的传统是疯子的传统；社会上的传统是顺从传统的传统，这里的传统是反传统的传统。虽然都是传统，到底传统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这正象在大街上的疯子显得太特殊，而在精神病院里，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倒显得太特殊一样。不疯的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最怕人家感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这使得这些正常人到了知识分子这个圈子里，也得多多少少装点疯、卖点傻。不装点疯、卖点傻，他们就太不象知识分子的样子了。但是，虽然得装点疯、卖点傻，但他们实际并不疯、并不傻，并且他们实际是比社会上的

一般人更清醒、更聪明的人。这就使他们陷入到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之中去。疯子们的疯，是真疯，不是假疯，他们实际是不正常的，但并不自觉为不正常；他们实际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但却意识不到这种危险，所以他们说出话来气格外的粗，胆格外的壮，做起事来也格外的卖力气，吃食不论，力气是不惜的。而这些装疯卖傻的正常人可就不同了。他们并不真疯，但又得装点疯；他们并不真傻，但又得装点傻。别人说他疯、说他傻，他心里犯嘀咕，老怕别人看不起自己，老怕在分东西的时候分给他的比别人少；别人说他不疯、不傻，他们心里也犯嘀咕，老怕别人说他不象知识分子，不象真疯子那么独来独往、狂放洒脱。他们是知道真疯子的危险性的，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象真疯子那样敢笑敢哭敢怒敢骂，他们怕得罪人，尤其怕得罪自己不能得罪的人。他们说话说得特别有分寸，比那些没有文化的粗人更知道说话的分寸。但他们又得用知识分子的那套疯子的语言，特感情，特夸张，感情得、夸张得让中国语言裂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们巴结人巴结得中国语言都有了酸味，而诅咒人又把中国的语言诅咒出了一股毒气。想说真话，想说心里话倒没有词了。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文化颇得到社会的赏识。人人知道他们是装疯卖傻，所以也就能信任他们、重用他们。要是他们真疯、真傻，事情反而不好办了。屈原是个真疯子，他弄出了个诗国；孔子也是个真疯子，一个布衣之士，狂妄地自以为能够拯世救民；屁大的个官也没有，却想叫诸侯国王听他的摆布。不是疯子是什么？但他死了以后却真地被当作圣人供了起来，读他的书也能升官发财了，就有很多人到他的思想王国里来了。但来了不是真地为了拯世救民，而是为了升官发财，而即使为了升官发财，还是得装出一副拯世救民的样子来。孔子的《论语》里说的原本是一些疯话，到了做试帖诗、八股文的文人那里，就是装疯卖傻了。他们

不装疯卖傻不行，真疯真傻也不行，只有这样装疯卖傻而又让人知道不真疯、不真傻才能出将拜相、立身扬名。这就是他们比孔子聪明的地方，幸运的地方。但话又说回来，诗和文到底还是疯子们搞出来的，他们的装疯的诗、卖傻的文到底无法同那些真疯子相比，不但社会上对他们不满意，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真正满意。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是装出来的，与这些真疯的前辈是无法比的。就是因为这点不满意，也有个别装疯装成了真疯子的，例如汉代的贾谊，原来也无非是要到皇帝这里来做官，但搞来搞去，搞得当真起来，就学着屈原的样子，跳到水里淹死了。到这时，他可算是真地发起疯来。但他们到底还不是象屈原这样的全疯全傻的人，所以对传统就没有多大损害。总之，知识分子这个圈，原本就是为疯子们留出来的。这里也有传统，但却是反传统的传统，而社会上的传统，则是顺从传统的传统。但后来又出了更多的装疯卖傻的人，它就变得比其它领域更加复杂起来。但不论怎么复杂，真疯的还是个别的，装疯卖傻的还是多数；反传统的还是个别的，不反传统的还是多数。

我以为我这篇文章还会写很长很长，一直能够写出一个结果来，写出一些教训来。写到这里我才感到，我这篇文章其实已经写完了，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假若非要我加上一点教训人的话，那就是，我劝大家不要反传统。只有疯子才反传统，我们不愿当疯子，所以也不要反传统。不论人类走到哪里，传统都会跟到那里；不论传统跟到哪里，社会的多数人都都会喜欢传统，并在传统中找到自己的一个温暖的窝。谁要是想把这个温暖的窝给掀翻了，他们就会与你拚命，就会与你过不去。所以不论哪个时代，都是只有疯子才反传统。他们是疯子，人们不会相信他们的疯言，不会支持他们的疯行，因而他们也不会成功。当然，他们有时也会弄出点新玩意儿，得到社会的夸奖，但那时他的玩意儿还